

追捕老纳粹纪实

〔奥地利〕西蒙·维森塔尔 著

淑琴 张峤 译

时波 校

北岳文艺出版社



追捕老纳粹纪实

〔奥地利〕西蒙·维森塔尔 著

淑 琴 张 峤 译

时 波 校

北岳文艺出版社

追捕老纳粹纪实

〔奥〕西蒙·维森塔尔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25 字数: 216千字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4,100册

*

ISBN 7-5378-0418-4

I·396 定价: 4.20元

引言

人到80还写书，必会告诫自己，这是写最后一部书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必然会格外细心，构思下笔一丝不苟。然而我，自1945年来，数以百计的案件从我手中经过，我多么想将它们的来龙去脉、起因结果一五一十地写成书啊。的确，对我来说，每一个案件都是重要的。譬如说吧，我想起了普热梅希尔犹太人区的司令约瑟夫·施瓦姆贝格，我是在阿根廷搜寻到他的踪迹的，他因杀害了成千上万条性命，理所当然地被判处了死刑。然而，象其他许多案例一样，他的案情未被写入本书，否则这部书恐怕会比现在的厚3倍。我只能叙述某个方面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例；有的是因为追寻找索异常困难，有的是由于罪犯或罪行特殊，还有的是因为至今对我们来说仍有其重要意义。

本书所陈述的，要我的追缉活动中最有声有色的部分——这不等于说，某些声色欠佳的方面无足轻重。

我完全明白，此书的出版商首先要求的是可读性强的故事情节——可是我认为，首先要考虑的是亡故者和恶贯满盈的罪犯。

这类著作还有另一个问题：它给人的印象是，书中描绘的卓著业绩似乎都应归功于我；书中介绍的失败挫折其责任似乎也应我一个人承担。造成这种印象的部分原因是我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写作方法，另一个原因是我的工作特殊性，

出于安全考虑，我不能随随便便地公开合作者的姓名。读者不难想见，我之所以能从巴拉圭获得极其机密的情报，绝非是我有什么顺风耳和千里眼，而是多亏了活跃在当地的某个人的努力。如果道出此人的姓名，或者扼要地说明一下他搞到这个情报的方式，我将会给他带来杀身之祸。

不过，我仍然要借这最后一部著作提供的机会，向在我工作中助过我一臂之力的部分人致以深切的谢意。我知道读者对此无甚兴趣，但是我已到了这样的年纪，我想借此书的几页版面表达一下心情，告诉他们我有他们这些人为朋友，心里是多么高兴。

我首先想到的是奥地利人，其中有犹太人社团已故主席伊凡·哈克尔博士和他的后任保罗·戈洛兹。在天主教徒中，我最亲密的朋友要数已故的作家兼哲学家弗里茨·黑尔，多亏了他，我对犹太人同基督教徒的关系才有了深刻的认识。我跟红衣主教弗朗茨·柯尼希也曾多次切磋过这个问题，他承认数世纪以来，天主教会对于犹太人屡犯罪过。象他这样坦诚认错的天主教要人尚为数不多呢。每当奥地利掀起反犹太人的喧闹时，红衣主教柯尼希总是据理相劝，循循疏导。

在布鲁诺·克赖斯基总理恶毒攻击我的时候，在有人依仗着某个非法的议会小组千方百计地要把我赶出奥地利的时候，有两名新闻记者给了我特殊的支持，他们是《侧面报》的彼得·米夏埃尔·林根斯和《信使报》的阿尔弗雷德·佩尔莱特，后者眼下在奥地利电台供职。奥地利的抵抗运动也挺身而出，反对针对我的流言蜚语。在奥地利人把克赖斯基视为近乎善良的上帝的时候，这个运动这样做，其领袖、社

会民主党人布鲁诺·切马克是要有极大的勇气的。尽管有这么多人向我伸出热情的手，我仍曾感到自己在克赖斯基的奥地利十分孤独。在那种时刻，我就告慰自己，在别的国家我以前有过——现在依然有——比在奥地利多得多的朋友，他们都是热心人。

在我女儿和外孙们生活的以色列，同样有许多朋友。我首先要提到的是以色列档案馆馆长、艾希曼诉讼案总检察官吉迪恩·豪斯纳、以色列档案馆科学主任基尔米兹博士和我40年前就结识的新闻记者蔡姆·马斯；我的文章和书都由他译成希伯来语出版。

在说完以色列的朋友之后，我要立即提一提在联邦德国的友人，我的感情是真切。首先要介绍的是海因里希·京特尔特和阿道夫·科尔劳茨，他俩在第三帝国统治时期救过我的命，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只有我的钦佩之心才能与之相比拟。我的工作使我还结识了许多德国人，他们都是我的挚友。最重要的一位德国朋友是共和国派驻巴登—符腾堡州首府斯图加特的检察官罗尔夫·西希廷。不过，我还想列举中央调查局负责调查路德维希堡纳粹党滔天罪行的一大批合作者。我之所以旗开得胜，在很大程度上多亏了该局的帮助，特别是多亏了吕克尔博士和施特赖姆检察官的协助。

已故出版商阿克塞尔·凯撒·施普林格也给了我极其友好的帮助，他对犹太教和以色列的态度历来赢得我的敬意，尽管他的批评有时显得颇为激烈。至于赫尔穆特·科尔总理的好意，我在此书的好些段落中都有所提到。

1963年，我参加了成立不久的国际抵抗运动和集中营联盟，这为我结识该联盟主席、比利时将军阿尔贝·居里斯创

造了条件。这个组织里有一大批人博得了我的敬意，在此我想提及这样几位：秘书长于贝尔·阿兰、法国抵抗运动女杰玛丽-玛德莱娜·富卡德、丹麦上校比雅克·绍、联邦德国上校沃尔夫冈·米勒和巴黎圣母院前讲道者里凯神甫，后者是我在茅特豪森集中营的难友，他表现得十分勇敢。

1965年，我认识了夏尔·隆萨克，当时他是“蒙迪歌剧”通讯社驻巴黎的主任，是他敦促我撰写有关我工作的第一部书《杀人犯隐藏在我们中间》的。从那以后，他对我的关注已不再局限于我的文学创作；这种合作渐渐地铸成了火一般炽烈的友谊。在我这最后一部著作里，谨向夏尔·隆萨克深表敬意。

向我们的办事处提供资助的人不计其数，我向所有这些表示极大的感激之情。在某些情况下，经济帮助孕育出了互敬的友谊。举个例子说，我们设在林茨的办事处每月都收到伊斯拉埃尔·西尔贝舍恩博士寄来的款子，正好清付办事处的邮费和电话费（后来，我从联邦德国补发给我的退休金中拿出一部分来支付这两项费用），这样该办事处才得以维持下来。

在过渡时期，犹太人社团协会和维也纳祭祀协会将我们维也纳办事处的一切费用包了下来。与此同时，我们从荷兰方面也获得相当丰厚的资助：汤姆·罗思、西蒙·斯佩杰和汉斯·雅格布斯在那里建立了“维森塔尔基金会”，得到大批赞助费，政府免除了基金会的一切税款。25年来，我们每月都收到从荷兰寄来的汇款。可惜的是，基金会的创始人和主席A·施滕佩尔斯于去年离开了我们，他再也看不到这些文字了。他的继任是鲁德荣教授，这是位遐迩闻名的历史学

家、帝国文献研究所前主任，我同他也是多年的莫逆之交。另外，该研究所副所长本·西耶斯一直是我的参谋和私交。令人惋惜的是西耶斯也在几年前去世了。谁也填补不了他留下的空白。

我的感激之情不仅仅属于几位荷兰朋友，它是属于整个荷兰人民的：我认为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象荷兰那样关注过我的事业。我格外感激荷兰通讯社驻维也纳记者尤勒斯·胡夫，他始终全神贯注地关心着我的侦查工作。虽然许多荷兰人——其中就有胡夫——不理解我在瓦尔德海姆^①事件中的态度，但我们的私人友谊丝毫未受到影响。

美国的“杰威什文献中心”跟荷兰的“维森塔尔基金会”属同一性质。该文献中心获得的捐赠，同样享受免税的权利。该中心的发起人和首脑赫尔曼·卡茨，将设在纽约他公司里的一间办公室交给中心支配。多亏杰威什文献中心的慷慨资助，我们在大西洋彼岸进行了几次耗资巨大的调查侦缉活动，成绩卓著。如果没有中心提供的经费，我们的活动只好半途而废了。同样，为得到特雷布林卡城的司令弗朗茨·施坦格尔跳伞地点的情报，需要付7000美元，我们从纽约方面获得了这笔款项。赫尔曼·卡茨于1977年逝世，他的律师和纽约办事处的共同创始人马丁·罗森接替了他的职务。我的家人几乎已被纳粹杀尽，没有留下什么亲戚。有一天我向马丁推心置腹地说，我的一个宿愿是选择一个新家：如果可以的话，我将选他来做我的弟弟。

^①瓦尔德海姆，联合国前秘书长，现任奥地利总统。有人拿出证件证明他在德国纳粹军中服务过。——译者

果然，我们成了兄弟。

我的第一个美国朋友是位士兵。他叫雅各布·卡茨曼，是1945年结识的，那是茅特豪森集中营刚解放不久的事。当时他负责管理获释了的犹太犯人。我和我妻子同雅各布的友谊经历了40年的沧桑，一直延续到今天，其间因工作关系，我们曾聚过几次：雅各布担任过犹太工人运动联合会的总书记，后来又被选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执行局成员。目前，他在纽约各民办大学给青年讲课，努力把自己所知道的有关大屠杀的情况讲给年轻人听。

多年来我在美国结交了许多朋友，我还想举出其中两个人来：我的律师马丁·门德尔松和杰里·本德，前者是华盛顿人，后者在芝加哥。他俩对我有求必应，全力支持我的工作。

最后，我还想说一说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洛杉矶中心，它的研究课题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我之所以有如此殊荣，那是犹太教士马尔文·希尔、罗朗·阿纳尔和授业座^①贝尔兹贝格的学员们的美意。最近10年来，加利福尼亚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一直进行着情报工作，支持多项科学计划，着重致力于美国青年的工作。它促成了电影《种族大屠杀》的摄制，该影片于1983年荣获奥斯卡最佳文献片金像奖。

1987年，加利福尼亚州的参众两院一致决定拨款500万美元，创建“宽容纪念馆”，由西蒙·维森塔尔中心管理。而我认为叫“残忍纪念馆”这一名称要更为合适些，因为馆

^①授业座系犹太教教育机关，专门传授《塔木德》。二次大战后，授业座师生迫于纳粹的残害，纷纷逃往英格兰、美国和巴勒斯坦等地。——译者

内展出的许多图片都是一幅幅残忍的景象。

不过，陈列馆的一部分展品显示了抵抗运动，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期，该运动也没有平息过。我是乐观主义者，我认为残忍只能在一时一地占据上风，而最后的胜利属于宽容。

西蒙·维森塔尔

1988年9月 维也纳

又及：我还要向我的秘书罗莎-玛丽娅·奥斯特拉和玛丽娅·格雷塞尔表示谢意，感谢她俩在我撰写此书期间给我的帮助。

序 言

西蒙·维森塔尔其人

彼得·米夏埃尔·林根斯作

我的出版商们都曾建议我撰写我的回忆录。不知道回忆录这个名称是否适合于这部著作，因为读者将会看到，书中写到的有关我私生活的情况实在太平淡无奇了：我结婚成了家，有一个女儿，还有几个外孙——对我来说，他们就是我的一切，但对读者来说，他们不会引起任何兴趣。如果说我的一生有什么引人入胜之处的话，那仅仅是指在民族社会主义^①统治下的那一段生活：在灭绝种族的大屠杀中我幸免于难，我努力保持着对死者的回忆。

年已80的我是活着的最后几个见证人中的一个。我只是以这种身分来撰写这部书的。

我请老友彼得·米夏埃尔·林根斯为我写几页文字，作为此书的序言。他长期工作在我的办事处，无疑是最了解我的人中的一个。如果让我说一

①“纳粹”系德文“民族的”和“社会主义”两个词缩写的音译。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党。

说自己的看法的话，他写的文字大体上是合乎分寸的。

西·维

他还在世，但“追捕艾希曼的猎手”就已成了千万百姓有口皆碑的人物：他不再只是条汉子，而是成了人们寄托激情的伟人。当然，这种激情在奥地利和德国与在诸如法国和美国等其他国家的表现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说自由世界把西蒙·维森塔尔视为伟大的正义者，那么他的大多数奥地利同胞却把他当做一个无情的复仇者。维森塔尔是在国外最受尊敬的奥地利人中的一位：他曾5次获得荣誉博士的称号，是荷兰奥朗日—纳索骑士团勋位、意大利共和国勋位和法国荣誉勋位骑士勋章获得者。联邦德国授与他大十字勋章，美国政府向他颁发了国会金质勋章。这个单子尚不齐全。然而在奥地利，数十年里他一直为人们所遗忘。心怀不良的人们（他们激烈否认这一点），把一位在维也纳市鲁道夫广场或萨尔茨托大街的一个狭窄办公室里忙于整理案卷的老人，描绘成追猎纳粹分子、毫无仁慈之心的面目可憎者。他的变化不定的合作班子被抬举成“一窝密探”，真有点受宠若惊。他的“文献中心”——在许多年里只是靠富裕的美国犹太人的慷慨才存在了下来——竟也成了同外国势力狼狈为奸、拥有无穷财源的“机构”。当他的无数劲敌都不敢说维森塔尔在捕获艾希曼的过程中没有起丝毫作用的时候，有人竟然将“追捕纳粹的猎手”的光辉业绩说成是神作用的结果，归功于一个叫詹姆斯·邦德的犹太人：他可以启开世界上看守最严的保险柜，他的柜子里塞满了秘密文件，他可以在地球的

任何一个角落里无情地出击，云云。

据说神灵（不管是“诸神”还是“魔鬼”）的本领就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的。

其实，奥地利人谁也不愿意弄明白，西蒙·维森塔尔究竟是怎样的人。这位复仇之神大有被贬为常人中一员的危险。

把维也纳城选为新的故乡的这个人，出生在奥匈君主帝国东部边陲小城布卡克（这个城镇也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①家族的摇篮——维森塔尔的岳母还是弗洛伊德家族中的一位小姐呢）。大部分犹太人在以基督教为主的环境里生活，或恰恰相反在犹太人居住区长大的。而在布卡克城里，犹太人占了居民总数的一大半：他们约有6,000人，而波兰人只有2,000，乌克兰人仅为1,000。因此，这些犹太人对自己的价值有着与众不同的看法：在布卡克，犹太人不是末等人（这个位置是留给乌克兰人的）。尽管波兰实行着全面的种族歧视政策，但在布卡克，做一名犹太人是十分自豪的。

同忍气吞声已成为第二本性的其他犹太人相反的是，维森塔尔在第三帝国遭到的皮肉之苦，远不象帝国给他的侮辱那样深深地刺伤他的心。他作为一个犹太人，从未产生过厌恶本种族的念头，另外，他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中的一员，他维森塔尔是个普通的犹太人，绝不盛气凌人。

在他家里，如同在布卡克城所有的犹太人家里一样，人们是虔诚恭顺的，同时也染有一丝当时开始复苏的东方奇特

^①弗洛伊德（1856.5~1939.9），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译者

的神秘主义色彩。

加利西亚^①是出色的犹太教教士们的故乡。

犹太教教徒不是神甫，而是贤人，这一阶层是司法方面的最低一级审理者。几乎历来生活在比自己更强大的种族之中的犹太人必须细心地防止内部争纷。他们恪守父辈们严格的性道德（这种状况导致了弗洛伊德暴怒），同样，他们的司法观也是严格和刻板的。维森塔尔常常说起，他小时候的一天，有人把他领到一间屋子前，窗后坐着一位男人。几年来此人不讲一句话，食物也吃得很少。人们把这个男人称为“静默者”。从前，“静默者”家里发生过争吵，他对妻子吼道：“你可以焚烧了！”当天夜里，一场大火不知怎的烧了起来，把“静默者”的家夷为灰烬，妻子死于火海。“静默者”在犹太教教士面前忏悔，后者罚他不再说话，永远坐在那里为自己的罪过祈求饶恕，直到去世。

西蒙·维森塔尔一直对公理持有神秘的看法。他深信——但又说不出别的什么道理——每一个生灵中，谬误和赎罪是相互抵消的。他常说：“生活中一切都有代价。”

谬误是不能否认的，只能用赎罪来弥补过错。这就叫做“报应”。

维森塔尔有一杆极其灵敏的秤来掂量“过错”和“赎罪”。重要的不是罪行的大小，而是它的性质。

他认识一个人，在他看来此人比许多杀人犯更罪大恶极，可是此人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他只是写了些明信片。他是林茨铁路线上一名警察，娶邮电局的一位女职工为妻。

^①加利西亚是东欧的一个地区，原属波兰。——译者

后者的血管里四分之一的血属犹太人。尽管他俩的婚姻受到一定的保护，但他执意闹离婚。分手之后，他就开始给她写明信片，每天都写，一天10封，每封信都充斥着辱骂人的言词，还附上一些从报上剪来的仇视犹太人的文章。明信片是不装信封的，邮电女职工的所有女同事都看到了信上的脏话。战争结束后，维森塔尔为这个女人弄到了一张纳粹主义受害者的证明。为此她只提供了一个证据：需两人才抬得动的一只箱子，里面放着数以千计的明信片。

“这是名副其实的酷刑。我希望那个男人每天每天都受到良心的责备。”

同德国和奥地利公众舆论的想象恰恰相反，维森塔尔总是一丝不苟地将所有的行为放到当时的具体背景中去分析。在他看来，一个临时拉去充当行刑队队员的人杀害了10名犹太人，其罪恶比一个没有任何命令而主动虐待囚徒、并使之手脚残废的人要小些。党卫队曾打过他无数次耳光，但都没有茅特豪森集中营里一名波兰书记官在他获释数天后给他的一记耳光那么深深地伤害了他。“那是排犹主义行径，他完全明白希特勒是怎样虐待犹太人的。”

美国人命令这位书记官向维森塔尔公开道歉，当波兰书记官伸出手来想在全体囚徒面前跟自己的受害者握手时，维森塔尔拒绝了对方，义正辞严地说：“我接受你的歉意，但我不能把手伸给你。”

西蒙·维森塔尔不轻易原谅人（这一点跟公众舆论对他的印象倒是吻合的）。这种固执不能说明他内心的态度。维森塔尔聪明过人，对过错极其敏感，因此不会轻易捐弃前嫌。他的言行举止都受感情的支配：维森塔尔不白白送人一

个原谅，只有对方认错补过后，他才同意原谅人。

原谅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维森塔尔的脑海里，他亲自说过，自己的“过去是抹杀不了的”。在他的优秀著作《太阳之花》中，他描述了战争期间他遇到的一次意外事件，不禁使他略有自责地提出了原谅这个问题。事情是这样的：

当时他在一家军队医院工作。一天，一位修女叫住他，将他领到一位濒死者房间里。

正在同死神搏斗的人是个党卫队队员。他抓住维森塔尔的手，开始忏悔起来：在死神折磨下，党卫队员惶恐不安，向维森塔尔交代了自己对犹太人犯下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滔天罪行。坦白之后，党卫队员恳求默默坐在他床头的这位从前的犹太囚犯宽宥他。维森塔尔站了起来，拂袖而去。

过不多久，维森塔尔探望了死者的母亲，面对这位一无所有的女人，他对其儿子的罪行只字未提。

同样的情况可以引起不同的反应：战后，在波兰，一大批从前的集中营囚徒又被关了起来，原因是他们新的专制统治下拒绝沉默。一些人——其中有一名妇女——被判处死刑。1946年，她在监狱内关押死犯的牢房里等待受刑。

一天，人们把她和另一名女犯带去洗澡。那女犯就是臭名昭著的女看守、奥地利女人玛丽娅·曼德尔，她从前是比克瑙市奥斯威辛集中营女牢里最残暴的人。

玛丽娅也已被判处死刑。

两个女人一丝不挂地站在喷嘴下淋浴，谁也不看谁。

蓦地，玛丽娅·曼德尔走近她，只对她说了这样一句话：“您能原谅我吗？”

后来获得赦免的波兰女人是这样描写她当时的反应的：

“我们是两个赤条条的女人，都在等待死神。我知道玛丽娅·曼德尔虐待过的人听不到我的回答。于是我对她说：‘可以。’”

维森塔尔知道她的这一回答。直到今天他还没有把握，自己是否已经正确地解决了原谅这个问题。正因为没有丝毫把握，他在《太阳之花》中增写了一个调查记。在调查过程中，他要求那些在他看来是伦理道德权威的人评判一下他的行为：他是对的，还是错了？

这是一场大辩论，有关文章占据了法国等国家各大报纸的好几个版面，但最后没有结论。

维森塔尔认为在一名挪威农家妇女给他的信中终于找到了结论：“您应该叫他祈求他的上帝原谅他。上帝会原谅的。”

维森塔尔本人不再是恪守教规的教徒。他那一代的许多犹太人在多年的同化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摈弃了父辈的信仰。可是维森塔尔仍坚守着犹太教的所有道德准则，因此，他依然为自己是犹太民族的一分子而自豪。

同样，在他看来犹太复国主义——还有一些人硬栽到维森塔尔头上的所谓世界性阴谋——不过是个历史现象而已，即犹太人找到一个祖国的希望而已。这个希望已经在以色列国的建立中得到实现，“诚然，今天应该为它寻找新的形式。”

布鲁诺·克赖斯基也是一个不守教规、没有复国思想的完全被同化了的犹太人。可是跟克赖斯基完全不同的是，维森塔尔仍怀着极大的同情注视着本民族的信仰和主义。在他看来，这信仰和民族主义是犹太教的精髓之所在，自从离开